

# 明代宫廷史研究回顾

Research on Ming Court History: A Retrospective

解 扬

*Xie Ya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5Vol.14

故宫学刊

二〇一五年 总第十四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 明代宫廷史研究回顾

## Research on Ming Court History: A Retrospective

解 扬

Xie Yang

明代宫廷史作为 21 世纪新兴的明史研究课题，在形成之初，很快就集合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从多角度发表了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既有个案分析也见方法讨论。它们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状态和方法论建设的成熟轨迹，也反映了研究者关注明代宫廷史的热情和所关心的议题。从已发表成果的质和量两个角度看，都需要我们进行初步的整理与回顾，以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能再行深入并开拓出新的领域。

本文述评的时段，从明史被现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开始，尤其注意明代宫廷史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开端性研究，并努力选择具代表性和前沿的成果作为示例。所论各议题的繁简之别，则依照相关研究的集中程度而定。对新兴领域的回顾，虽然篇幅或有不显，却可能蕴含着新的研究生机；对其研究价值与意义，一并于文末的展望部分。

### 一 明代宫廷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与方法论建设

明史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对象，以 1905 年章太炎、邓实等创办的《国粹学报》上刊载大量明季史书为重要标志。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明清更迭和明初立国这两个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段。当时，宫廷史尚未被纳入研究视野，唯孟森《明元清季通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34 年）研究从洪武四年到嘉靖三年明代女真的历史，涉及明代宫廷的内容。此书可视为第一代明史学家关注明代宫廷史的发轫。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 年）和李光壁《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为代表的第二代明史学家在通论性的明朝历史著作中涉及了明代宫廷的内容，但由于当时史学界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为主要研究对象，围绕明代宫廷的专门研究，尚未成为主流，也未显出成体系的趋势<sup>1</sup>。

改革开放之后，明史学者在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思想文化等领域，均做出了前驱先路

<sup>1</sup> 赵毅、栾凡：《20 世纪明史研究综述》，第 7～11 页。

的重要学术贡献，但以明代宫廷为核心的诸多历史问题，仍未成为研究的热点<sup>1</sup>。在传统政治史研究视野下，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专著虽然涉及明代宫廷的部分内容，例如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纲合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合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尚未形成本诸学术自觉和基于问题意识的明代宫廷史研究潮流，1988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大学出版社；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也是如此。

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院刊》复刊，80年代《紫禁城》出版发行，明清宫廷史的研究有了集中的发表园地，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出现，这两个刊物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晰。

可以说，直至20世纪80年代，此前的明代宫廷史作为新兴的学术课题，虽有前辈学者有所涉及，但尚未将之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集中地投入精力进行研究，其学科轮廓和规范也都还处在尚待成熟的阶段。宫廷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于是有了科学的表述，学者在整理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也有意识、成系统地开展宫廷史研究，推出新见。其主要表现是，学者就明清宫廷史的研究对象达成了共识：研究明代宫廷史，着眼点无疑是明代宫廷，包括宫廷里发生的事件、生活的人物及其形成的势力、产生的影响，但除了关注宫廷对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影响，甚至社会底层和国家边陲的影响之外<sup>2</sup>，宫廷受到的各种来自外部因素的反向影响，也该被纳入到研究之内，做到“宫廷建筑群、宫廷文化研究与政治史、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sup>3</sup>。此外，建筑、医学、礼乐、教育、养生、档案、典籍甚至动物等，也应该纳入到研究视野内<sup>4</sup>。具体到明代宫廷史的研究，可参看赵中男在《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4期）中列举的七项内容：1、皇帝与太子、亲王、后妃、外戚、宦官和有关朝臣的活动关系；2、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活动及其影响；3、后妃包括外戚的宫中活动；4、宦官集团的活动；5、宫中财政经济活动；6、与宫廷和内阁相关的朝臣活动；7、宫廷文化活动，包括不同门类的宫廷艺术的发展等。

## 二 明代宫廷史研究缕叙

在已有的明代宫廷史研究中，帝王政治和宫廷文化、艺术无疑是初期的主流，宦官、后妃等宫廷势力随后也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近来，从司法、教育、经济等角度出发研究明代宫廷成了新的研究趋势。

### （一）明代诸帝及其相关问题

明代诸帝是早期明代宫廷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在多以其传记为主要形式的研究中，帝王的宫廷生活、政治活动也被囊括在内，一并予以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郑克晟《明武宗》（《故宫博物院院

1 参看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郑欣淼：《序》，载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4～5页，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3 冯尔康：《从好奇到认知——宫廷史研究浅谈》，载《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12～14页。

4 徐凯：《宫廷、制度与文化——关于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几点想法》，载故宫博物院编：《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辑），第20页。

刊》，1981年第1期），在2009年的《紫禁城》还刊登了李洵有关明武宗的系列论文。围绕明武宗与豹房问题，海内外史学家还就豹房建造的目的以及武宗是否在豹房养豹等问题产生了分歧（韦祖辉《豹房与明武宗——兼与盖杰民、叶祖孚先生商榷》，《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虽然并未以宫廷史为主题，却围绕着明代皇权及其衍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皇权对明代政治体制及社会的影响等，作了系统的研究。此外，199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明代帝王传系列，由于作者皆为一时之选，加之编辑有力，在学界内外均有影响，其中涉及各朝帝王生活的部分，成为对相关问题的权威概述。之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中的明代诸帝传，也涉及他们在宫廷中的生活，其中包括吴晗《朱元璋传》、晁中辰《明成祖传》（2001年）、胡凡《嘉靖传》（2004年）、卜键《明世宗传》（2004年）、樊树志《万历传》（1993年）、《崇祯传》（1997年）等。由前辈和重要学者撰写的这些帝王传记已经给学术界成功地树立了榜样和规范，这些传记近年虽有再版，但在正规的史学著作中，体裁类似的更新之作并不多，相反，史学新锐多关心对王朝统治内具体事件、问题和现象的分析。

海外学者对明代诸帝的研究，集中体现在1988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中。该册依照时序，分朝代介绍了明帝国在各个皇帝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宫廷问题尚未引起学者的集中讨论。由于各章作者均为海外研究明代历史的领军人物，论述涉及的方面甚至深入程度都可观，唯限于体例，所论欠缺足够的注释作为佐证。但在该书1998年出版的下册（中译本《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明代宫廷也并未被作为专章研究或予以足够的重视，只在第5章《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和第10章《交通通信和商业》中略有涉及。

在明代诸帝与藩王关系的研究中也涉及了宫廷问题。陈学霖围绕明太祖与藩王的系列中、英文研究，为该领域视野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提供了范例。例如他的《明太祖〈纪非录〉书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利用《纪非录》分析了明太祖对分封诸王的教育和戒训问题；《明太祖与其儿子们的问题：秦王之罪与明初政治》（“Ming Taizu's Problem with His Sons: Prince Qin's Criminality and Early-Ming Politics”，Asia Major, 3<sup>d</sup>, 2007）是以秦王为例对明初藩王政治的研究。雷炳炎的近著《明代宗藩犯罪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则是从司法角度对宗藩犯罪问题的最新研究。

## （二）宫廷政治史、宗教史

在宫廷政治史范畴内，在午门外举行的廷杖是学术界较早讨论的问题。朱子彦《明代的廷杖制》（《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3期）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曹国庆在《明代的廷杖》（《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中细致介绍了廷杖的缘起、在明代施行的阶段性、种类、器具以及对明代司法的影响等。近来对明代廷杖的研究中，一些从受杖刑者和士人心态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值得留意，例如廖元琨《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南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李为香《关于明代廷杖的仪式解读》（《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不仅从廷杖本身所代表的维护皇权的功能进行分析，还讨论了士人对廷杖的心态。

有关廷议的研究也牵涉了明代宫廷和朝臣势力的博弈。曹国庆《明代的廷议制度》（《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专辑）对明代的廷议制度做了较早介绍。新近的成果是朱鸿林关于议定王阳明从祀过程的研究（《王

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日本学者城地孝也探讨了廷议在内、外廷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并特别针对其意见集约、形成共识的情形加以了考察（『長城と北京の朝政：明代内閣政治の展開と変容』第7章《明代廷议的意见集约》，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

从20世纪末开始，宗教、方术和明代宫廷的关系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多从政治史和艺术史角度展开，且以宫廷与佛教的关系为大端。代表性论著有陈玉女《明代万历时期慈圣皇太后的崇佛——兼论佛、道两势力的对峙》（《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23号，1997年），《明华严宗派遍融和尚入狱考——兼述隆万年间佛教与京师权贵的往来》（《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24号，1998年），《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台北：如闻出版社，2001年）。何孝荣《明代宦官与佛教》（《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明代北京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启樵在《明清皇室与方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中，论述了明太祖至明世宗对方术的喜好或依赖，还举专章讨论了晚明诸帝对释老的情有独钟和内监们对方术的崇尚。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从长时段讨论了明朝历代帝王及宦官与佛教的关系。乙坂智子《帰つてきた色目人——明代皇帝権力と北京順天府の手ベツト仏教》（《横浜市立大学論叢》2000年第1-2）以色目人为线索，讨论了明代的宫廷权力与顺天府的关系。从艺术角度切入宫廷与宗教关系领域的有童赛玲《明代宫廷艺术与西藏本土佛教美术风格的相互影响》（《新美术》2013年第5期）。

能反映西方学者对明代朝廷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明代朝廷的文化、朝臣与竞争：1368～1644》（*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该书围绕明代宫廷与士大夫乃至普通民众的关系，从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政治史、艺术史和音乐史等角度切入，集合个案以成概观。

### （三）后妃

明代的后妃数量大，但研究者的关注度却略显薄弱。对此问题的整体性概述有林延清《明朝后妃的历史作用》（《明史研究》2012年），提出要重视对明朝后妃的研究。对相关侧面的具体研究有王伟凯《明代后妃的选配与编制》（《紫禁城》1995年第3期）对后妃的人选要求、选择的的地域范围和选择标准做了初步研究。赵克生《明朝后妃与国家礼制兴革》（《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涉及了洪武丧服改制、宣德贵妃授宝、弘治别庙奉慈、嘉靖皇后丧礼减杀等问题。程彩霞《明代后妃制度的政治文化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侧重对明初后妃制度的解读，同时将该制度对外戚的影响也纳入了研究视野。另外，陈梧桐《马皇后与明代宫廷政治》（《故宫学刊》2013年第1期）是对马皇后对明初政治影响的个案研究。相关的个案研究还有林延清《明朝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刘毅《明世宗薄待后妃皇子》（《紫禁城》2002年第3期）、赵秀丽《明代皇后生存状态与后权的式微》（《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2008年第3期）、谭平《后妃与明代政治》（《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邱良任《明代的选秀女》（《紫禁城》1993年第1期）、徐春燕《明代后妃的号》（《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张凤荣《明清后妃的冠与帽》（《紫禁城》1995年第3期）等。

#### (四) 宫廷军事史

David M. Robinson的《尚武的明廷》(Martial Spectacles of the Ming Court,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是从军事史角度讨论明代政治的代表作,也是作者继主编《明代朝廷的文化、朝臣与竞争:1368~1644》之后,围绕相同主题的深入之作。该书标题虽然是明帝国的朝廷,却较多关注了有关明代军事的诸多方面。全书论述依时序展开,既留意到元、明、清三朝所显示的中国文化的尚武传统,也参照西方文化,集中地突出了明廷在国家军事行为上的统治权(rulership)问题。

在明代中后期诸帝中,万历皇帝的系列对外征战尤为引人关注。肯尼斯·斯沃普(Kenneth M. Swope)在《双刃剑之舞: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万历帝》一文中(“Bestow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Wanli as Supreme Military Commander”,载《明代朝廷的文化、朝臣与竞争:1368~1644》)将明世宗视为当时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分析其在被称为“万历三大征”中的主动性和军事才能。(“Bestow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Wanli as Supreme Military Commander”)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与以往万历帝怠政不朝形象不尽相同的明神宗面貌。

斯沃普关于该问题的更系统研究是他2001年完成的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论题是《万历皇帝的“三大征”,1592-1600:朝廷、军事与十六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The Three Great Campaigns of the Wanli Emperor, 1592-1600: Court,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e Sixteenth-Century China”,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在论文中,作者不仅分析了战事的筹备、军费的调配,还研究了皇帝就主动推进战事与保守阁臣所进行的争论。

#### (五) 宦官与厂卫

明代的宦官群体和厂卫势力是较早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明宫廷势力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王崇武、朱畸觚、李树桐、翦伯赞等前辈学者就明代厂卫机构的设置和宦官干政等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建国后,又有吴晗、尚钺、李洵、李光壁等在专著中涉及宦官问题(郁蕾:《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继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1年)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从政治制度视角分析明代的厂卫,仍然是学界主流,但研究视野已经从讨论宦官的政治权势、特务活动等,拓展至围绕宦官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外交等多个主题,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宦官生平也有研究。但正如齐畅的分析所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仍存在套用阶级分析方法和对宦官群体贴标签的研究局限,突破传统政治史框架,仍然值得期待,故而有学者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给予了期望。(齐畅《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兰州学刊》2007年第9期)

具体而言,专门针对锦衣卫的研究有限。陈鸣钟对明代厂卫的由来以及厂和卫的沿革、编制与职权,特别是厂和卫关系的分析是对此问题的先驱性研究。(《明代的厂卫》,《史学月刊》1954年第4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针对厂卫职能与权势的具体研究,其中徐连达《明代锦衣卫权势的演变及其特点》(《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商传《明代的特务机构——东厂》(《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具有代表性。方志远对镇守中官在内地和边镇事务中重要作用的研究(《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文史》1994年第40辑)

和对御马监的研究(《明代的御马监》,《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冷东对宦官监军制度的初步研究(《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为我们提供了两个有益的分析视角。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厂卫问题的研究,逐渐从以政治史为中心拓展到关注宦官在经济、军事甚至司法层面与朝廷之外的势力发生关系的问题。早期的开拓性研究有郑克晟对宦官庄田的研究(《明代中官及中官庄田》,《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杜婉言对宦官与地方经济的系列研究(《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浙江学刊》1988年第6期)。关于史料方面的研究有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在此领域的新近研究数量多,但少有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突破,唯采用新视角和充分的个案分析者可为借鉴,如谢贵安《论明代儒臣与宦官在皇帝娱乐中的影响和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齐畅《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徐冰彬《试析明代宦官内操的兴衰及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1期)、胡丹《志书中的明代宦官史料》(《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在司法方面,怀效锋对宦官在明中叶参与司法事务的分析(《明代中叶的宦官与司法》,《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是该领域的重要论述,此外还有吴高庆《明代宦官特务司法初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明朝宦官特务司法研究》(《当代法家》1998年第3期)和张德信《明代的法外用刑》(《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此外,视角的转换和史料取用范围的扩大,也有助于深化厂卫的研究,例如张金奎以诏令为基本史料,分析了明代的锦衣卫侍卫君主和军事职能、缉事与捕盗职能、司法职能、外事和其他职能(《锦衣卫职能略论》,《明史研究论丛》第8辑)。

## (六) 宫廷教育

在宫廷教育领域,帝王、皇子和内官教育是三个重要的方面。对宦官群体所受教育的情形和程度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如方志远(《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总结了宦官知识化是三条途径:入宫前本是儒士,因而具有读写能力,入内书堂读书和自学,并通过《酌中志》、《罪惟录》、《明书》等史料进行了举例分析。胡凡对包括宦官教育在内的皇帝教育、皇太子教育和诸王以及宦官教育等三类宫廷教育做了综合研究(《明代的宫廷教育》,《江汉论坛》1990年第7期)。

内书堂作为明代宫廷的教育机构,学术界一直予以了充分的研究热情。赵映林《明代的宦官学校——内书堂》(《文史》1989年第6期),欧阳琛《明内府内书堂考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伟凯、郭文明《明代的宫廷教育——内书堂读书》(《紫禁城》1990年第3期)是对该机构职能和性质的研究。梁绍杰《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举例析说了内书堂及其十种异名。新近完成的博硕士论文也有就此议题再行研究者(如潘才高升《明代内书堂考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吴仕伟《明代宫廷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近来有学者注意到士大夫群体本诸“致君尧舜上”的经世精神,试图通过编纂教化用书来影响宦官群体的教育水准与方向,以期达到致君泽民的目的(吴兆丰《有教无类:中晚明士大夫对宦官态度的转变及其行动的意义》,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包诗卿《明代宦官教育新析》,《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围绕明代诸帝的经筵日讲,学者从经筵的制度、用书和讲官与皇帝的互动等角度展开研究。杨业进《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从明代经筵制度的建立、经筵日讲的形式及与内阁的关系等角度,展现了这一重要的明宫廷教育制度在明代的运行概况。对此问题的个案研究,有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2006年)、《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9、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曾一民编:《林天蔚教授纪念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The Jiajing Emperor’s Interaction with His Lectures”, Chapter in David Rov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朱子彦《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2期)。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樱井俊郎《万曆初政の經筵日講と『歷代帝鑑圖說』》(《大阪府立大学紀要》2001年第49期)。其中,朱鸿林研究的特色在于,不止于研究经筵制度本身,更通过经筵日讲,研究了讲官当进讲时解读经书的特别思考以及皇帝在经筵中显出的专制性。

### (七) 明代宫廷美术史

早期的明代宫廷绘画研究集中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与画轴的个案分析上,大体从文物和艺术两个角度展开。例如穆益勤研究了明代宫廷绘画的组织概况、阶段特点和主要画家的作品及风格,得出了明代的宫廷绘画是从两宋画院以来“画院体”的继续和发展的结论(《明代的宫廷绘画》,《文物》1981年第7期)。此外,对明代画院制度的考述和画家的个案研究,也是早期明代宫廷绘画史的研究重点之一。如对明代未设画院问题,除了单国强先生外,还有李维琨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李维琨《明宫未设画院缘由之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总第7辑)。对画家的个案研究有刘道广《明代画院之制及戴进事迹考略》(《美术研究》1989年第4期),高昕丹《明代宫廷画家吕纪的时代及其花鸟画寓意试析》(《新美术》1997年第3期)等大量的研究成果。

从艺术角度对具体画轴的研究,早期有单国强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宣德年间前后的四幅名家画轴为对象,对其三国故事题材所做的细致介绍(《明代宫廷画中的三国故事题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在此四幅画轴的个案分析基础上,单国强提出明代宫廷绘画的特点分别是故事画、帝王肖像画、帝王行乐图、现实题材人物画和承袭传统的人物画等,并从艺术角度分析了明代宫廷人物画的艺术特色(《明代宫廷绘画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对明代宫廷绘画机构和画家的系统论述,分别是穆益勤从绘画流派角度的《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和从图像资料整理角度的《明代宫廷与浙派绘画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近年来围绕宫廷美术,有一些新的研究趋势出现:如对明代宫廷画家隶属群体的研究,有聂崇正从明代宫廷画承袭宋风的角度和明、宋两朝在文化上后先继承的角度进行了诠释(《明代宫廷中何以浙闽籍画家居多》,《美术观察》1997年第4期)。对宫廷画家政治身份的研究,有聂卉《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等。

此外,有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画刊》、《中国书画》、《故宫学刊》、《新美术》、《国画家》、《荣宝斋》上有关明代宫廷画家的大量个案研究。

关于明代宫廷绘画的研究,笔者认为有两个可突破前人研究的现象值得留意。一是新作品的被发现与迅速被研究,例如聂崇正对新发现的明中期画家何浩的《松图》的研究(《一幅新发现的明代宫廷绘画》,《紫禁城》2004年第4期),是对何浩画作的考订之作。二是注意到书画作品在历史上宫廷文化圈中的收藏与流通,例如李若晴的《书画在宫廷文化圈中的收藏与流通——明初宫廷绘画研究的新视角》(《美术学报》2007年第3期),不仅突出了宫廷这一政治特色鲜明的群体的文化性,还从书画的收藏与流通角度展开研究,显出有别于此前艺术史界从书画作品的鉴定、描述角度展开研究的新视角。

#### (八) 明代宫廷艺术与戏剧

对明代的宫廷戏剧,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郑莉和李真瑜各自围绕明代各个时段宫廷戏剧的特色发表了系列成果:郑莉《洪武朝的礼乐制作与明代宫廷戏剧的复苏》(《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治定守成与明永宣时期的宫廷戏剧》(《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明后期的宫廷戏剧》(《四川戏剧》2013年第8期);李真瑜《明永乐朝的宫廷戏剧》(《紫禁城》2009年第2期)、《明正统至正德年间的宫廷戏剧》(《紫禁城》2009年第4期)、《明嘉靖宫廷戏剧的正中之变》(《紫禁城》2009年第5期)、《万历朝的宫廷戏剧》(《紫禁城》2009年第6期)、《启祯两朝的宫廷戏剧》(《紫禁城》2009年第7期)、《南内心词送南朝——南明弘光朝宫廷戏剧》(《紫禁城》2010年第3期)。

#### (九) 明代宫廷饰物与生活雅趣

对明代宫廷服饰、饰物的研究,学者多能将具体文物与代表性物件所体现出的宫廷艺术潮流相结合进行分析,也有学者将制度因素也纳入考虑,令分析更显系统性和深入。这类研究多为图文并茂,注重细部分析。

该领域的重要著作是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此外,张彩娟《明代嫔妃墓出土礼仪用玉与冠服制度》(《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1期)、张广文对明代宫廷服饰用玉的研究《明代的服饰用玉及玉佩坠——宫廷服饰用玉及其影响下的玉佩饰》(《紫禁城》2008年第8期)、王丽梅《万历皇帝两位皇后发簪的差别》(《紫禁城》2007年第8期),胡德生、毛宪民《明清皇宫便溺的处理》(《紫禁城》1993年第2期)的研究也都能显出视角上的新意。近期在服饰方面,有董进发表在《紫禁城》上的系列关于明代宫廷服饰的研究(《紫禁城》2011、2012年)等。这类研究选题广、数量多,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涉及皇宫内皇帝、后宫和宦官,甚至火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可参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紫禁城》。

对宫廷雅趣的研究,目前数量不多,高寿仙《明代宫廷的休闲娱乐》(《文史知识》2012年第1期)是对此问题的重要概况性分析。高寿仙《明代皇家饲养的珍稀动物和宠物》(《紫禁城》2006年第2期)则是对具体问题的析说。李大鸣《明代宫廷的端午射柳》(《紫禁城》2006年第6期)是对宫廷内端午节特色的介绍。

应该说,明朝留存下来的宫廷饰物和能表现生活雅趣的物件数量庞大,难以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论证,因此以这类留存物件为本,结合相关学科和领域的拓展性研究,是今后能提供给学术界新知的有力视角,特别要加强文物研究的历史性,而不应仅仅停留在文物本身。赵连赏《明代赐服与中日关系》(《明史研究》第9辑)、张雯《明定陵出土金簪装饰中的佛教因素》(《东方收藏》2014年第2期)便是可为借鉴的例子。

### (十) 出版印刷

对明代宫廷出版问题的研究,是亟待加强的学术领域。已有研究有温斌《明代宦官与图书刊刻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8期)以司礼监掌管的内府刻书为中心,分析了宦官在宫廷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以及内府刻书的特点。海外学者从艺术史的角度对此问题略有涉及,但专门的研究,尚待深入,如张珠玉(Scarlett Jang)1989年完成的未刊博士论文(“Issues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Themes of Chinese Court Painting.”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89)。

## 三 明代宫廷史研究前瞻

已有的明代宫廷史研究,虽然在学科框架下进行有意识地系统研究起步较晚,但从上述的综述和分析看,研究涉及的广度和深入的程度都非常可观。可以说,目前已经初步建筑起了明代宫廷史研究的重要基石和基本轮廓,后来者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行拓展和精进。

上述的回顾显示,已经取得的明代宫廷史研究兼顾了明代宫廷的特色和明朝历史的特性,研究关注点多元,问题意识也集中。但因为研究的角度尚有待进一步拓宽,因此相关研究的特色虽然鲜明,学科间的交叉却显得不够,这便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拓宽视野的要求。以宫廷饰物为例来看,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尚未被纳入到整体分析的视野下,对来自宫廷外部的经济助力和多元的人事因素,考虑就显得不够。因此,提升明代宫廷史研究的历史性,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器物、制度、现象的具象研究,是可能推进相关研究的思路。

其次,加强明代宫廷史研究的社会性,令动态与静态两相结合,是可能进一步拓宽明代宫廷史研究视野的新思路。动态可以指具体的人物,也可以是运行中的制度,若能将两者恰当地结合于明代宫廷这一对象上,就可能使研究纳入更多的社会因素,令宫廷本身不致太过孤立。

再次,在把握明代宫廷特点的同时,注重所研究问题的体系性。这样既可以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又能在追求具体个案研究的精彩之余,实现重要的突破,形成宫廷史研究在具体问题上的创见和体系性创新。

此外,还要把握内、外廷的关系,在区分宫廷和朝廷的关系基础上,把握朝臣和宫闱这两个彼此不同却有关联的重要政治、文化要素间的关系。

最后,在把握明代宫廷特色的同时,还要注重明清故宫政治、文化的延续性是如何体现在如今故宫博物院这个物质基础上,也即,明清宫廷史的内在延续性不能因为断代而作决然的硬性分割。

